

■ 新作聚焦

刘亮程长篇小说《本巴》：

关于时间的童话史诗

□ 张 瑜

大概每个生活在异乡的作家都有一部返乡之书——一本关于故乡的大书，讲述一个被世界藏起来的地方，有着不为人知的壮阔历史。这本书的存在，使这个地方免于被隐匿的命运，作为遥不可及的史诗样本存在。刘亮程的新作《本巴》便是这样的作品。故事讲述了三个孩童之间的博弈，在他们的“搬家”“捉迷藏”和“做梦”游戏中，我们漫游在本巴国和拉玛国的无边旷野上，在这片时间缝隙中的草原上，目睹了被讲述过千万次却从未揭开面纱的梦中故乡。

孩童之眼

这是一个从上帝视角观照的故事。时间像是被剪辑一般，本巴国人人都活在25岁，所有人的父母都在遥远的老年里走失，只剩下洪古尔一人停在没有岁数的童年。后来他只身赴战却身陷囹圄，本不愿出生的弟弟赫兰为了营救他被迫降生人世，赫兰用“搬家”游戏让拉玛国的所有大人变成孩童，但这却正中敌国汗王下怀——只要停在青年里的本巴国人不衰老，他们拉玛国人就回到童年不长大——这样就会有绝对的胜算。赫兰与洪古尔短暂的相见被突然出生的哈日王轻轻踹碎，这个在母腹中掌控国事的孩童仿佛拥有上帝之手。

对于洪古尔而言，这是一场只能用“使命”来消解其意义的找寻。主人公的身份充满了反讽意味：“少年英雄”只能将自己引向命定的衰老，变成本巴国草滩上无人敢与之对视的唯一一位老人，仿佛一个老人的目光也会让他们染上衰老。从他和弟弟赫兰被哈日王一脚踢飞、各奔东西那一天起，为了找到弟弟，洪古尔教会那些孩子玩捉迷藏游戏，现在，他把自己藏到了谁也找不到的老年。

对于赫兰而言，曾经在母腹中他孤独地听见人间的喧闹，从不想降生，后来他降落在自己走向哥哥的脚印里，本要沿着反方向回家的他却被哥哥的捉迷藏游戏困住了——不再有人找他，意味着他永远走不出游戏，在那个游戏里赫兰一直藏到今天，身边只有落荒的风声。

在这种双向的叙事中，前后皆是寻找。然而，不同于一个人迷失时慌乱的张望，也不同于一个人踽踽独行后的随遇而安，刘亮程表现出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高超的叙事能力，让游戏带来的“幻象”，带领洪古尔和赫兰去往那些在往常注定无法见证的景象：老牧羊人夫妇将70年的光阴煮在一碗酩酊茶里，光阴和人畜的脚步日复一日地移动在山谷中，莽古斯们在梦中被策马而来的江格爾提刀斩杀，于是他们只能睁着眼熬过一个又一个黑夜……

每一个生命找到真我的背后，都由无数个生命中堆积的时间、无数抉择的岔道、无数意外的经历、无数失落理想、无数被忽略的瞬间构成……其中包含着我们内心所望的全部秘密，而我们找寻的路途中，几乎不会意识到它们的真实存在。刘亮程借助孩童之眼看见了这一切，奇异，他只能看着，虽然他那个故事里的世界休戚与共，就像第一人称隔着第三人称，就像童年隔着衰亡，就像我们脆弱的美梦，永远隔着艰辛且无奈的现实。

刘亮程用一部本巴国的“孩童书”写尽了远离故土的人们遭受的沉痛创伤：比起遗忘，真正难捱的，是人们试图寻根的每一次尝试。

孩童之梦

本巴国汗王江格爾和拉玛国汗王哈日王在“做梦”游戏中博弈，本来江格爾在梦中杀死对手的父后就关闭了梦境，却不想也将自己的父亲困在梦中。时隔多年他终于又做梦了，是因为他那被铁链拴住的父亲在等待儿子的营救，梦是先人和他们联系的唯一方式。江格爾夜夜做同样的梦，带着汗国所有的人和牛羊，营救父辈的队伍转眼成了奔赴故乡的队伍。哈日王就在此时控制了这场梦，盛夏的出行变为寒冬中的迁徙，全本巴国都在他的梦中耗尽力气。这是最后的丧失，因为绝望取消了所有的可能性。梦境的幻象带江格爾来到衰老和死亡未曾离开的时候，甚至更早，江格爾的父亲也曾经经历自己父亲的衰亡，并就此担起重任征伐四方。

在这本书里，刘亮程写了如此多的梦境。写梦境带给人恐惧和死亡，也写梦境带给人胜利和成长。然而，最惊心动魄的还是江格爾得知他们只是史诗中的虚影，而创造本巴世界的部族正在面临灭族之灾。一个儿子在寒夜里苦苦寻觅着父辈的家乡，最终发现那片故土才是真实，自己所处的世界全是虚妄。能预知过去未来99年凶吉的谋士策吉的这段话令人难忘：

哈日王早知道这个世界是虚构的，知道自己是故事里的人，让故事变得好玩、有意思，故事才能走下去。一个不好看的、被人抛弃的故事，肯定是故事里每个人都没有尽力。

你的父亲乌仲汗也早知道这个世界的荒诞，他用沉醉对付自以为清醒的那些人。江格爾你带领我们坚守在25岁不往前走半步。不愿长大的洪古尔和不愿出生的赫兰，都让我的世界变得不一样。那个哈日王，更是做足了一个故事中的能事，他倒腾出一场一场的故事，最后用做梦游戏，让我们知道，原来我们的本巴世界是由东归途中一个孩子说唱出来的。而这个孩子和他的整个部族，都生死未卜。

这真是一个汗王人生中所能遭遇的最震惊最悲凉的事情，在他的余生中，他会不断返回这“崩塌”的一天。从某种程度上，梦境背后的真相击碎了



他的信仰，让他知晓了不属于草原的那个世界。然而这种感受是如此私密，以至于他僵在那里好久之后才问：如果我们全回去，会扭转他们的命运吗？策吉回答：“梦一旦说破，便再也回不去了。”

可以想象，即使哈日王在洪古尔只身远征时就如实相告，本巴国的勇士们也不可能相信，甚至认为这不过是敌国汗王的又一个计谋。一个讲述者就是这样掩藏起关于故乡最重要的真相：衰老的真相、影子的真相、游戏的真相，一句话，通向真实故乡的那些至关重要的真相。只有重新来到史诗传唱的场景，唱到那些为部族死去的英雄，遥远的故乡才会重新浮现。而所有流血牺牲带来的疼痛，共同构成了本巴国被藏匿的故乡。

孩童之书

当热血铺就返乡之路，赫兰从史诗的碎片中拼凑出这片土地上一代代人的梦境。也许从三年前的秘密筹备开始，或者从二百年前他们带着史诗西迁开始，拉玛草原被另一个帝国吞并的不幸命运就开始了。创造梦的部族在一代代老去，勇士因作战而死亡，东归还得继续，回乡的路太长太寒冷，那些倾听过史诗的耳朵被全部冻硬，然后腐烂在草地里。因此，宁愿所有人都忘记真实的故乡，在虚空之上编造出全新的神话，编造出一个“新桃花源”的故事，好让自己相信梦境中的未来。

然而，刘亮程在小说里放大了这场梦的呼喊。当花脸蛇在石头下吱吱说话，当乌仲汗想要挣脱铁链借梦逃生，当草原上的所有女人追随阿曼夫人聚集到70岁里——它们印证着几百年来这片草原上发生的事实：一些人离开故土的代价，由另一些人承担；一些人享受着力量和青春，而另一些人只有艰苦返乡的无尽长路。人们无力改变什么，只能在无常的梦境中漂转沉浮，直到每个人的影子流淌成一条光阴的河。当我们更认真地做梦时，真实的生活就会被我们颠覆过来。

二百年前，土尔扈特部族东归，也带回了史诗《江格爾》，两年后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，《本巴》的故事开始生根发芽。刘亮程用一部本巴国的“孩童书”写尽了远离故土的人们遭受的沉痛创伤——比起遗忘，真正难捱的，是人们试图寻根的每一次尝试。

■ 第一感受

激情燃烧的生命书写

——《梅洁这四十年》读札 □ 刘江滨

近些时日我沉浸在《梅洁这四十年》一书中，尽管书中大多篇章以前都读过，此番阅读算是情感与心灵的重温，但依然有一种潮涌浪卷、春雷滚动之感。读梅洁的文字，总是像火柴遇着磷片，一擦即被燃烧。全书45万字，分为上下两辑，上辑“梅香苍茫山水——梅洁文学作品选”，下辑“共话天地人间——评论家、作家视野里的梅洁”，另有“附录：梅洁文学创作40年主要文集备考”。显然，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作品精选集，而是梅洁40年文学创作的里程碑，也给读者和研究者清晰勾勒出写作轨迹及脉络。

我和梅洁是“革命友谊”已达30年的老朋友了。至今我珍藏着一封梅洁1993年1月6日的来信，那时她调回河北省文联当专业作家不久，家还在张家口。1992年，林非先生主持编撰《中国当代散文大系》，河北作家的作品收集和评述由我承担，因此我和梅洁有了通信联络，这封信是她给我的回复。开头部分这样写道：“江滨同志：你好！我不知如何表述我读你洋洋洒洒长信时的心情！就好像我走得很累很累时，突然走过一个人，要与我搀扶同行；也好像我独自坐在海岸的礁石上，静静地聆听大海不倦的拍浪声；还好像我匆匆忙忙走过街头，突然发现路旁的树一夜间挂满了鹅黄……”这段话文采飞扬，激情四射，初次结识就让我充分感受到梅洁的真诚与热情，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。“大系”收入了梅洁4篇散文：《爱的履历》《我故乡的大河》《贺铸映象》《那一脉蓝色山梁》。我写下这样的评语：“梅洁的散文可谓最具女性特点，真挚清幽，婉约绵丽，氤氲着情绪化的氛围，盎然的诗意中有着浓郁的抒情色彩。女性那种不安分

的生命躁动、情感韵律与爱的激越、感伤抑或无奈，都丝丝缕缕盈盈而出，昭示着鲜明的个性与女性意识。”

20世纪90年代初散文热勃兴，一个文学现象如星耀天空璀璨夺目，即一批女性散文家携

带着主体意识的觉醒跃上文坛，如王琦瑛、唐敏、素素、斯好、韩小蕙、韩春旭、梅洁、张立勤、叶梦、苏叶、筱敏等，用当时的话说“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”。她们突破以往的政治和公众话语体系，以发现自我、张扬个性为其中的一个。鲜明的个性与女性意识。梅洁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我参与编撰“大系”的时候，恰是梅洁从事文学创作最初的10年。她以诗起笔，继而散文，并开始涉猎报告文学。如果把此时的梅洁写作比作“澄澄映霞苇”的清澈溪流，那么，此后梅洁就逐步走入“月涌大江流”的苍茫与雄浑。在漫长的写作生涯里，梅洁不断拓展着写作路数和探索审美旨趣的递进，日趋成熟，蔚成大家。

从文学经历和文学地理来看，梅洁生在汉江之滨，属南方女子，后来长期生活在北方，与生俱来的温婉细腻和耳濡目染的粗犷苍劲，两种气质杂糅交织，天然地赋予一身，形成了梅洁独特的审美气象，这是上苍的赐予。

从文学创作规律来看，走出“舒适区”，开拓更大的艺术天地，是每一个有所成就的作家的必由之路。梅洁的早期散文创作虽然多是自我的生命抒写，但因具真情流淌、真挚感人，深刻体悟着人性底色的驳杂丰富，有些作品至今仍未失为经典之作。梅洁却在反省和反思：“始终在用自身情感缔结着一个又一个人生的‘结’，婉约、忧伤、自悯、悲弱”，因此，“焦渴地寻找着一种突破，一种生命和文体的双重突破”。她读了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，恍然醒悟，找到了突破的路径，散文要“更本质更深刻地负载起人类丰富博大的心灵情感和精神思想”。于是，她写出《泥河湾》《驿站》《天下蔚州》《历史的祭坛》《走过房陵》等可配称大散文的作品，她把视野从自身的日常生活挪移投向历史文化深处。

从文学体裁样式来看，梅洁散文和报告文学兼擅，这两种体裁虽然同属一个母体，文体分野却也判然分明，散文是“写我”，强调自我的生

命感受和体验，报告文学是“写他”，更关注社会生活和典型人物，一个内倾，一个外向，一个主观，一个客观。梅洁以散文成名，然而成就她的却是报告文学，她的“南水北调中线移民三部曲”《山苍苍，水茫茫》《大江北去》《汉水大移民》产生了巨大影响，《西部的倾诉》获得鲁迅文学奖。这些作品不再汲汲于案头清供、一己悲欢、个人忧伤，而是深切关怀人类的生存与命运，把深情的目光投向了大地和百姓。大漠、高原、戈壁、沙滩、履痕处处，以至于艰难的跋涉损坏了膝盖。她和着眼泪与一腔热血把情感、生命融入民众之中，为之忧戚、呐喊。梅洁在她的作品里，将小爱升华为大爱，将微观叙事变为宏大叙事，将个人倾诉变成“西部的倾诉”，民众的倾诉。

可以说梅洁实现了她想要的突破。但必须要指出的是，这个突破既不是文体的转换，更不是说报告文学优于散文，而是思想的突破、精神的突破、境界的突破，作者构建了赖以支撑文学大厦的坚实基础——格局和胸怀，这才是文学突破的关键。

梅洁在一次访谈时说，“我至今认为我不是一个纯粹的报告文学作家，我一直倾心于散文的写作”，她把那些报告文学称为“那是我大散文，或者说，那是我对于散文创作的一种更广阔的深入和更深度的创作补充”。这体现了梅洁的大散文观。她把散文的细腻、抒情、心灵感受等主观的美因素糅合到报告文学中，使她的报告文学具有了散文的质地。在梅洁看来，“真正给予作品生命的应是永远的真挚与激情”。激情源于对生活对世界的热爱，是一种蓬勃、饱满、燃烧的情态，是一种不竭的创作动力。

长达40年的创作，读者对梅洁及其作品的热爱长盛不衰，《梅洁这四十年》，仿佛是梅洁一个四十岁的生日庆典。而四十岁不正是人生华彩时分吗？激情燃烧的人不会老。梅洁是梅树，一任繁花如故。

■ 关注

何建明新作《流的金 流的情》聚焦成都双流，用现实主义手法致力于“航空经济”的书写，塑造出一群为创造美好新生活而矢志不渝的建设者形象。看似碎片化的故事，传递出具有示范作用的美丽中国建设生动画卷。激情下的内涵表达，带着强烈的视觉冲击，在书写中既着力勾勒灵魂的崇高，也在不断地开掘和探索中，全景式展现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巨大发展成就。

何建明始终围绕着不同时期的中国社会发展在记录。这种时代之笔，体现了特定的价值取向，也让人深切感受到对于传统文化精神的固守，也揭示出情怀的力量，无论是《山神》中默默无闻的黄大发，还是《那山，那水》中的动人乡村故事，抑或是大气磅礴的《浦东史诗》，无不蕴涵作家深沉的思考，这种倾心坚守的“国家叙事”文体，并非是简单的书写，更多是精神深处的表达，是他结合自己对当下形式的研判，尝试着不同的创作方法，细致入微地讲述着中国故事。

文学反映生活的真实。何建明长期从事报告文学创作，宏大的叙事手法如符码般深入作品，尤其从超越精神的内涵中所传递出的思考，已不完全是现实中的人格重构，而成为精神品格下的真实书写。某种意义上，他对现实生活的反映，是让读者清楚“中国当代文学价值、意义、本质”。他对于笔下的人物、事件、环境、文化等，都可以融入自我的体验，强烈的真实表达下，还原或观照着深刻的思考和审美，这正是他在作品中力求实现的美学底蕴。

报告文学写作于何建明而言，早已是生活的日常和全部，这样的状态，让他始终关注着底层群体的生存状态，关注着国家日新月异的发展。总的来看，他的作品都心怀国家和人民，不任意夸大，不刻意回避，既符合传统的审美方式，也在生活化、人性化的文字中，丰富着报告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。这样的创作体验，审视着人生百态，写活的历史，最重要的是以适当的距离进行审美，从容把握阔大的精神，带着温情直面这个时代。写理想，是要在精神中确立起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，让情感变得生动，富有爱意；写现实，是在复杂的现实叙事中还还原真实，多维用力去深入挖掘人性和历史真相，让作品充满生活味、人情味。理想与现实的审美观照，其实是人性书写下的冷静认识。这种真实抒写细致入微，包含着深入独特的思考，也写进了情绪和自我的认知，这样的真实既是对人性的观照和审视，也是叙事视角下的体验和张力，使得作品始终散发着时代的能量。

现场叙事的魅力，在于身临其境的现场感，像新闻直播一样，从不同观察视角充分调动多种感官博采众长。这样的叙事特征，虽以艺术为支撑，但始终遵循“直笔实录”的真实，连续呈现出人物或事件的发展过程，使故事情节不断丰富，最终形成跨文化的书写。

上海对何建明来说是陌生而又熟悉的。何建明的现场叙事更多地表现在零度聚焦，在接连接完成了《革命者》《浦东史诗》《上海表情》《第一时间》等作品后，他在无形中也与上海的前世今生紧密相连。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：一是从局外人的视角看上海；一是以“上海人”的视角看上海。两种不同角度的观察，自有不同的发现和表达，所以，何建明在书写上海时先选择了这座城市的前世。革命历史题材的《革命者》，深度描写上海大革命时期的波浪壮阔，在叙事中不但用史料证明上海革命地位的重要，也对参与上海革命风云的革命者形象进行刻画，在无比震撼中完成精神丰碑的塑造，呈现出史诗般的悲壮叙事。

何建明选择英雄主义的书写，用宏大叙事对中国革命重大历史时间和时间节点追根溯源，重返当时那让人热血沸腾的世界。这样的书写是对革命者精神的写照，也从社会层面对上海红色文化进行挖掘。喜欢用细节来描绘全景的何建明，在以渐进式的介入感接近上海、了解上海。《浦东史诗》也是在写历史，不同之处是选取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机。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伊始的星火之火，一个是国家为实现伟大跨越的“大跨越”，都是发生在上海。如此看来，上海不仅能孕育红色革命，还能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，比起散发着沉重气息的《革命者》，作家这次很直观地写下了新上海的纷繁变化，写出了新上海的光明前景。

上海只是何建明讲述中国故事的一个关注点，书写上海的同时，他也努力捕捉着属于这个时代的变化。《国家行动·三峡大移民》写尽了个人、国家、民族的痛与爱。他通过底层群众的角度去审视国家发展的历史，并将自己的态度和思考置于复杂的情绪中。他以底层百姓生存状态的艰难去传递爱与希望，让人看到属于中华民族的坚韧性格。这种发乎于心的关怀，实际上已在体验中超越了现实书写。在《诗在远方》中，“阅宁携手，山海情深”的人性光芒，无疑是深厚而又丰富的生活经验的采撷和总结，让何建明用文字镌刻下“阅宁经验”的生动感人。在《那山，那水》中，作家也是通过全方位、多视角的采访、调研，不断打造着身临其境的感觉，使之更具有可读性、权威性、可信性。

说到底，何建明所要表达的文化魅力，在于作家的思想是否深刻，能否表现出时代的精神。《大桥》中的“小表情、大世界”的反映和对比，完全就是围绕着“国家叙事”在进行，从历史与现实方面发出时代新声。而《江边中国》《山神》《大桥》《时代大决战》等作品，也都是站在国家的高度去叙述、去记录、去讲述。

只有真实，才能让叙事富有震撼力、说服力、感染力。这些效果的产生，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图景、历史往事、时光变迁、精彩人生，无论是反映社会危机，还是面对各种精彩纷呈的变化，都有着审美书写下的深切关怀，都无法离开情感的支撑。何建明的写作主要着眼于社会热点、焦点问题，通过不断的报导去挖掘人性，表达着对现实社会和人性思考，以及对传统价值的建构，这是作家必须要承担的使命。在《第一时间——写在春天里的上海报告》中，作家真实面对上海这一现场，经过不断的体验和观察，写出这座城市面对疫情时的火热，让人从真实面对中感受到力量。《那山那水》散发着人情味和忧国忧民的情怀，让读者逐渐走进作家内心世界。

如果说，细节是报告文学的亮点，那么情感无疑是贯穿报告文学的气血，越真实越能打动人心，越细腻越富有审美情趣。何建明的作品既能当纪实作品来读，也能视为史料来见证社会发展，某种程度上，他的写作是对于人生的冷静观察，是真实叙事下的引人入胜，是宏大叙事下的情怀表达。

现实主义笔触下的纪实表达，更多基于国家重大历史进程和重大历史事件，书写这种独树一帜的审美品质，不仅意味着作者对时代的时刻关注，同时也有着作者对于“国家叙事”内涵的独到解读。《浦东史诗》中，作家写出了浦东新区30年的发展变化历程，深层表达了国家力量下的时代精神；《大桥》反映了港珠澳大桥的艰辛和伟大，实际上是建设美好社会的理念和情怀。何建明的这些作品，取材于大视野、大工程，表现出作家的自信、担当；其次，敢于直面新时代国家、社会发生的变革，力争写实，写全这个不断开放发展创新的时代，这需要文字上的驾驭能力，更需要对社会发展的敏感和前瞻的目光。此外，他善于以小见大，用小人物的成长历程来反映大时代。以这样的视角进行深度挖掘，反映一个时代的风气风貌，使得报告文学架构更具张力，更为生动鲜活，从而在情感和故事的交织中，实现了时代图景的细致描绘。

作家一种职业，其实更是一种生活方式，何建明的书写是深入挖掘后的思考，是另辟蹊径下的感受，是艺术化的真实记录，只有如此，才能展现出人物的个性、和事件的全景。通常情况下，故事是平民化表达下的特殊视角，情节是平民化情感下的微观表现和精心描摹。这些特点都鲜明地体现了作家浓厚而又真挚的情感，让人从生动、有趣或沉重中感受到作品的质感。何建明的作品喜欢以故事化的叙述放大细节、刻画细节，从人物身上发现和渲染不同的情怀。《根本利益》中提出的“共产党员一定要为人民做事，尤其是为弱势群体着想，我们的党在百姓中才有威望”；《部长和国家》中血浓于水的真情实感，平民化视角下的情感流露是对于平民情怀的还原。

文艺的根在社会底层，如果不能从报告文学的审美情趣和责任担当切入，这样的经验和现象无从谈起。何建明坚持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，观照人民的生活、命运、情感，表达人民的心情、心愿、心声。这种站在百姓立场的写作，可以视为一种文学现象，其实也可以当作何建明的写作经验。《中国高考报告》《落泪是金》《恐惧无罪》写出高考大军的现实境况，作品中所刻画出的人物，有着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的精神，在文学大观园中熠熠生辉。到了新世纪，他在《国家》《国家行动》《大桥》等作品中的精神建构和情感升华，直接导致审美变化和矛盾都非常突出，但在这样的精神底色下，他打破以往报告文学单一化的模式，无论是写浦东改革开放、港珠澳大桥建设，还是写天津大爆炸、南京大屠杀，“宏大叙事”中更多关注大事件中的历史细节，“时代意见”中聚焦与建构的是时代精神。

这些经验体现出“国家叙事”的魅力，就是时时以国家视角为基点触动人心，以史诗般的笔触“获得描写和叙述的自由”。其文化价值和精神，就在于作家关注时代、关注民生的社会责任。通常情况下，这种融入自我观察和思考的报告文学选题，自然也蕴涵着作家的人生经验。无论是着眼人间烟火气息的日常生活，还是关注对社会、民族或国家的重大事件，本质上都是为读者解读和揭示不为人知的真相，以文学的形式展现生存的艰难、人性的伟大、人类精神的不懈追寻。

对于人文精神的坚守与追求，对生命的反思、叩问与坚守，是何建明多年来人生况味的“碎片”系统聚焦，从中可以依稀窥见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。这种家国生命体验下的审美，充盈着报告文学创作的经典范例，也是作家对于“国家叙事”乐此不疲的关键。某种意义上，何建明的精细书写主要基于真实的第一手素材，看似松散无力的事情经过记录，演绎出日常书写的要义；看似倾向于宏大叙事，隐匿的却是细节构成的文化内涵。报告文学的写作应该在现实书写中讲述大时代下的中国故事，让老百姓与国家发展息息相关，也使得人物的表现与时代发展相融合，逐渐承载起为国、爱国的精神理想 and 追求。

中国故事的多样化书写

□ 常晓军